

于醒民 唐繼無

從閉鎖到開放

學林出版社



从闭锁到开放

于醒民 唐继无

学林出版社



《沪》新登字第 113 号

责任编辑：褚大为

封面设计：文忻

从闭锁到开放

于醒民 唐继无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 120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第四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58,000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 199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册

ISBN 7-80510-827-4/K·41

定价：5.75 元

目 录

第 一 章	沙船世界	1
第 二 章	“赤佬来了!”	53
第 三 章	大火轮	93
第 四 章	万国博览会	127
第 五 章	畸形儿	157
第 六 章	举国若狂	189
第 七 章	黄浦江畔的“欧风美雨”	217
第 八 章	海上狂士与“文艺复兴”	245
第 九 章	“不夜城”之谜	279
第 十 章	中西交汇涌人才	311
第十一章	变革：从这里跨入现代	341

第一章

沙船世界

“闽、广、辽、沈之货麟萃羽集，
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

——嘉庆《上海县志》

“迢迢申浦，商贾云集，海艘大小
以万计。”

——黄本铨《襄林小史》

明朝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10月，上海来了位大人物。

驾着快驶沙船神出鬼没的海盗们，早已发现有几艘彩绘官船在长江南沿太仓、宝山、嘉定一线游弋。他们暗中注视着这支船队，终于看到大明皇朝的财政部长——永乐皇帝亲予拔擢的户部尚书夏原吉——在蘆草浦(后来的吴淞口)上岸。

这是个阴森森的黄昏，夏大人的脸色也冷峻之至。他无论如何也料不到此行竟使自己名垂青史。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他确是因此行而大悦龙颜，得以主持全国财政大权达二十七年。这位从湖南湘阴赶到南京入太学的心计不凡的结巴子，这位敢于在朱棣率领北兵杀到南京时迎接新天子的户部主事，从此被列为海内最出色的理财家、水利家。

然而，在当时，他却是唉声叹气、愁眉不展。作为永乐皇帝的非正式的钦差大臣，他此行肩负着特殊的使命。表面上，他是来上海治水的，实际上，是为了根治万岁爷的一块心病。其时，正统的皇明臣民对朱棣自立为明天子还有不服，暗地里骂他是篡位者，因为他夺了自己侄儿建文帝的皇位。建文帝是由开国圣君洪武皇帝钦立的，虽然如今不知下落，但要是他突然在什么地方振臂一呼，天下局面又将不堪设想。这正是朱棣的头号心病。此病不除，朱棣就不敢高枕无忧。后来听说建文帝已逃往西洋，朱棣于是命亲信太监郑和准备下西洋，交通各国各

邦，暗访建文帝行踪，行期定在永乐三年，出发港就在上海吴淞江口。郑和下西洋的舰队将有巨舸大舶 62 艘、将士 27000 余人。夏原吉视察再三，发现吴淞江黄浦江入海之口断断乎不可能成为一支庞大舰队的始发港。而圣断已定，钦命已下，郑和舰队的巨型船舰已在南京城外龙江船厂开造，还要尽快在刘河（今浏河口）兴工。

夏原吉当时看到的景象真是糟透了。吴淞口、黄浦江流域的水患十分严重，满眼是泥沼泽国，池、塘、浜、河统统乱了套，河床不像河床，水道不像水道。吴淞江，这条上海地区最大的河流，带头乱淌乱泄，下游至陆家嘴以西（今虹口一带）一段变得弯弯曲曲，人们干脆呼之为虬江（意为弯曲之江）了。当时上海的第二条河流黄浦江，上游尚可，而由闵行向东入海这一段走的却不是宽道，江水不是直泻东海，而是泄往两岸。

这难道就是名闻遐尔的通洋商埠上海么？这难道就是与日本、大食、邕人等夷商番客大搞贸易的上海么？吴淞江、黄浦江上的港口不都是夷商云集之地吗？

是的。上海与海外的通商贸易由来已久，史书早有记载。

三国时，孙权在这里造出的青龙舰已能远渡重洋。青龙镇即因而得名。

唐代，浦东与虹口以北叫沪海、华亭海。那时吴淞江的出海口宽达 20 里，是海上转运的要地。杜甫诗中“吴门转粟帛，泛海临蓬莱”和“云帆转辽海，梗稻来东吴”等句，即是指这里的海运情况。

至晚唐和五代，这里的海外贸易已相当引人注目。“珍货远物毕集”。日本、高丽、契丹、大食的货物纷至沓来，从大食输入的猛火油还从这里转销契丹等地。

宋代的上海地区已是名符其实的海上贸易繁华地。“蛮商

贾舶，交错陆於水之道”便是当时海上贸易繁荣的真实写照。宋人应璩在《青龙赋》中描述青龙镇“市廛杂夷夏之人”，说明外商在这里已司空见惯。当时的上海，“海舶百货交集，梵宇亭台极其壮丽，龙舟嬉水冠江南，论者比之杭州”足见其繁盛。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设上海镇，并设华亭海提举司及榷货场。为维护上海地区的繁荣，疏通经常淤塞的吴淞江及上海地区其他水道，曾征民夫5万，死者1126人，费钱米169341贯。成千上万的生命与金钱铺就了上海港的基石。到元代，上海由镇升为县。上海市舶司系全国七大市舶司之一。“海外诸国俱来贸易”。吴淞江出口之一的刘河口“通海外番舶，蛮商夷贾，云集鳞萃，当时谓之六国码头。”信奉伊斯兰教的外国侨民还在松江创建了清真寺。元世祖忽必烈远征日本的基地也设在上海。元代供养大都（北京）的漕粮系从上海发运。著名的上海通蕃海船经改装后定型为一种不怕黄海沙滩的大船——沙船。靠着沙船运去的漕粮，元代的大都表面上维持着一个准世界帝国的形象。为保证这个港口的畅通，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一次发卒数万，由浙西行省平章彻尔主持疏浚吴淞江。

可是，吴淞江的淤塞还是越来越严重。当夏原吉来到这里时，泥沙似已毁灭了这个位于长江出海口的天然良港。面对“浑潮卷沙而来”，以致“水灾频仍”的情景，夏原吉简直是一筹莫展。

正在夏原吉焦灼之际，上海人叶宗行向他提出“弃故道，浚范家浜，引浦水以归于海”的疏浚黄浦江计划。

这是一项宏伟艰巨的工程。放弃闵行以东的黄浦江入海故道，免得泥沙倒灌，江水横溢；同时疏浚夹在吴淞江和黄浦江之间、南北流向的范家浜，让黄浦江在闵行以东向北改走范家浜河道，在陆家嘴与吴淞江会合，浩浩荡荡直涌至吴淞口入长江、

奔东海。

夏原吉终于不辱使命，明成祖也因为郑和舰队如期在上海出发而龙颜大悦。然而，我们今天所庆幸的是，一个纯粹个人的动机却引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性结果——一个天然的世界超级良港由此而形成。

自此，游弋在上海附近各港口的数以千计的沙船有了自己的远航基地，一如游子回到了温馨、安全的母亲怀抱。它们将在这里躲避扬子江的险浪、东海的惊涛和太平洋的狂澜。有了这个天然良港作依托，沙船的活动范围大大地扩大了。它们从这里出发去进行海外贸易，踪迹遍及太平洋沿岸各国。沙船成了当时中国与海外诸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工具。

夏原吉治水后，上海腾飞似地发展起来。以至于到了永乐十年(1412年)，在吴淞口东高桥镇北临海处不得不筑起一座方圆百丈、高30余丈的土山——宝山。山上设烽火，昼举烟、夜明火，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海舶指路。上海上缴的赋税也从明初每年16万两猛增到嘉靖年间的每年40万两，从占松江府钱粮的五分之一迅速上升为二分之一。

在夏原吉开浦通海之后二百八十年，上海的发展又面临着一次历史的选择。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局面要复杂得多。如果说，上一次抉择是决定了上海的自然面貌的话，那么这一次要解决的却是上海的社会发展模式。

清朝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上海的命运可以用开和闭两个字概括。

是年10月27日，康熙在一片“我皇万岁”的呼喊声中首次南巡来到苏州。这位开明的皇帝极力做出“与民同乐”的样子，在虎丘大殿参加宫廷乐队的演奏，并尽量和颜悦色地对恩准前来

进谒的市民答道：“你们百姓多有寿！”但是，外表的轻松、开朗，并不能完全掩饰住皇帝的心事。在苏州，圣驾既无意游览曲径通幽的江南园林，也无心品尝别具风味的美味佳肴，却特意登上停泊在城外的海船，仔细询问了上海一带的海上贸易情形。

是什么事情如此牵动着九五之尊的圣心，使之必须借南巡之机躬亲察访呢？原来不是别的，正是给不给上海开“海禁”之事日夜困扰着这位大清皇上。最近一个时期，要求开海禁的舆论与日俱增，各地的奏章接二连三地呈上了康熙的御案，以致圣上不得不在一个月以前发出一个“开海贸易”的上谕，以安东南商民之心。然而，当时上海尚不在恩准弛禁之列。他只御批云台山（今江苏连云港）、宁波、漳州、澳门四港弛禁，浙江沿海的船民亦可出海。至于上海，或弛或禁，对大清朝的利益非其他地方可比，所以康熙不得不格外谨慎从事。

康熙当然知道，上海的“海盗”从宋代起就有了名气，以后虽经改朝换代，然盗情日甚，史不绝书。顺治年间，台湾郑成功政权的舰队与上海的“海盗”舰队联合，渡扬子江如履平地，差点拿下清朝半壁江山的事，使康熙对上海的“海盗”不敢掉以轻心。他一直担心台湾的郑氏势力、残明的海外势力，同上海的“海盗”势力联合起来。为了不让这个可怕的局面出现，康熙不惜与荷兰殖民主义者的舰队勾结，以壮大自己的海上力量。

台湾郑氏政权归顺清朝后，消除了康熙的心腹大患。于是，郑氏政权所代表的东南沿海的商业力量渴盼保持并扩大海外贸易的愿望又在皇帝的利益权衡中有了地位。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郑氏政权的首脑郑克塽来到北京。郑氏向圣上历陈利害，终于使康熙相信：开海禁能进一步赢得海商的臣心，对大清朝有利。

唯一使康熙放心不下的是上海。在上海，“海禁”可谓严矣。护海塘前竖有禁牌，上书：“居民过限者，枭首！”严酷的灭族连坐之法更使人望海生畏。可是，严厉的“海禁”并没有使上海附近的海面平静。海盗活动日甚，并大有不可收拾之势。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3月14日，4艘海盗船冲进吴淞口，抢走漕船上的漕米400余担，并放炮打死前来追击的守备司起龙。一品大员昭武将军杨捷赶来上海应变，也束手无策，反被康熙下旨处分：“声张若是，将军降级”。

上海的海盗船大部分是沙船，船型相当大，可载百余人。就在康熙首巡江南前不久，为“下海会剿”海盗，竟出动将军1名、提督1名、战船24只、水师兵1500名。这还不是出动兵马最多的一次。康熙二十二年冬曾一次出动大沙船60只，交战结果，只与海盗打了个平手。为了防海盗，清朝官府不得不把漕船也装备起来：船两侧设绵帘，8尺长，5尺阔，用新布4层，内塞厚絮8寸，锥锁打眼，并画虎头在上。

麻烦还在于盗、商难分。“海禁”时期的海盗中亦盗亦商者不少，他们能商则商，不能商则盗。也许，有些就是商民，被“海禁”逼到海上为盗的。因此，海盗中颇有做生意之风。被海盗劫去的人，也可以用钱赎回来。这使人想起中世纪至近代的地中海海盗。

“海禁”也没能禁住上海人的海外贸易。上海的船照样开到日本去做生意。不用说，其中不乏“海盜船”。在此期间，到日本各港行商的这类船只，数量达每年40多艘。日本人称这些上海船为“南京船”，因为它们运来了中国“南京省”的商品。日本的中日关系史学者木宫泰彦把“南京省商品”的目录整理出来，真是洋洋大观。

“书籍、白丝、绫子、纱绫、绉绸、绫襪、罗、纱、绉、闪

缎、南京缎子、锦、南京绡、金缎、五丝、柳条、袜褐、捻线绸、金线棉布、绢袖、棉布、斜纹棉布、丝绵、皮棉布、丝线、纸、信纸、墨、笔、扇子、箔、砚石、线香、针、栉篦、香袋、人造花、茶、茶瓶、瓷器、铸器、锡器、镶嵌金银的刀护手、漆器[堆朱(螺细)、青贝描金、朱漆、屈轮、沈金]、光明朱、绿青、明矾、绿矾、红豆、芡实、槟榔子、檀香、芍药、黄精、何首乌、白术、石斛、甘草、海螵蛸、紫金锭、蜡药、花石、纸制偶人、角制工艺品、革制文卷匣(俗称拜匣)、刺绣、书画、古董、化妆品及化妆用具、药种”。

这份单子中的好多商品，像槟榔子、檀香、红豆等是上海以至江苏、浙江所不出产的，显然是转运商品。在“片板不许入海”的“海禁”时期，竟能贩运如此大量的外贸商品，“海禁”之实效可见一斑。

这种商盗纠葛的复杂情形几乎一直是影响上海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商盗矛盾解决得合理与否实际上决定着上海经济社会的命运。因此，让我们来撷取几个历史片断，从中窥视古代上海的商盗交浑的情形以及历代统治者的治理方法和实际效果，也许是不无益处的。

元朝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春的一个黄道吉日，黄浦江边的上海镇成了锣鼓与鞭炮的世界。上海历史上像这样热闹非凡的日子称得上是盛况空前。船户们、市民们尽情庆贺、狂欢般地祝祷，竟是为了两名前海盗的荣升。张瑄，原籍嘉定；朱清，原籍崇明。两人在这天正式掌管设在上海的二个都漕运万户府。原来的四个管理漕运的部门合并为这二个，原来的蒙古人达鲁花赤忙兀鲁等不再掣肘其事，一切由张瑄、朱清二人掌之。

这可是非同小可的大事，漕运关系整个元帝国的命脉，而张瑄、朱清二人系南人——元朝官定的最低一等人。几个月前，朱清仅为千户，张瑄仅为中万户（元朝统兵5000以上为中万户）。而且，两个人都是货真价实的海盗，且为最著名的上海海盗。早在宋朝末年，他俩的海盗名声就远播内外了。

万历《嘉定县志》记张瑄，“出没海上，不可踪迹”。《崇明县志》记“宋季群无赖聚海上为盗，朱清、张瑄最为雄桀。”有的史籍表明，他们同时是海商。在他们受招安前后因海外贸易而发了大财。

在这之前，华亭海（上海）的盗与商就分不大清。有一点可以肯定：要想贩盐或其他货物，不在船上置备武装是不行的。各种明版县志表明，这些人是敢于同官兵一战的。《华亭县志》记：唐朝乾符六年（879年）“海寇王腾据华亭县城”，宋代的华亭知县刘俣“禁逻兵胥吏扰沿海民船”，时上海尚未设镇、设县，“沿海民船”指的是上海（华亭海）的海商，对他们得客气点、温和点。从华亭海到崇明岛，自唐代以降，海盗多、海商多是其特点。《宋史》上出现崇明的名字是因为海盗的缘故，“绍兴元年，都统制王德歼贼邵青于崇明沙。”这是正史上第一次关于崇明的记载。邵青即是海盗。

说宋元之间的上海是海盗世界（或海商世界）未尝不可。张瑄、朱清主管元朝海运，标志着海盗得道，到了一个高峰。赫然不可一世的天骄皇朝似对上海的海盗折腰，大都（北京）的俸禄有赖于这两个海盗的筹划，以使漕粮安然北运。与此不无关系，第二年设置了上海县。当时的松江知府仆射文在建设上海县的奏章中讲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华亭地大，民众难理”。《元史》中叙及这一点时说：“海洋则与辽东相通，番舶往来，私盐出没，侵碍官课，虽有刑禁，难尽防御”。这段话画龙点睛

地说明了：这些海盗与“番舶”进行海上贸易。

当时站在黄浦江边的张瑄、朱清，其踌躇满志、威风凛凛之态是不难想象的。他们肯定毫不怀疑自己是大元皇朝创行海运的大功臣，眉宇间流露得意非凡的神色。最早海运漕粮仅有60艘沙船，运了一个不大的数目：46000余石。到至元二十八年，已上升到一年达152万石以上。后来，朱清又查勘了一条新航线，较以前的二条航线更便捷。从上海到大都只要旬日便能驶到。果然。到了天历二年(1329年)，每年从上海发运的海漕达到352万石以上。

他俩没有忘记自己曾是海盗头目，没有忘记自己宏大的事业离不开那些穿风入涛的“海盗帮”。在上海镇举行盛大庆祝活动，他俩看到最兴高采烈的正是一群群往日受到官府追捕的海盗(海商)。

他俩始终保持着海盗习气，作风豪横得令人生畏，“有拂其意，则缚而投诸海。”这像是在海上实行海盗法律。一个十分蹊跷的史实是：他俩督运的海漕有一部分永远到不了大都，作为“漂没”而报损了。一般每年报损十几万石，最多的一年达24万多石。谁能肯定这些“漂没”的漕粮不是进了他们的私囊而是入了波神之口呢？

然而，由于他俩率领大量海盗(海商)归顺元朝，确实使元朝赢得了东海的安定。元军统帅伯颜灭南宋后，命张瑄、朱清将宋朝的皇朝档案、牒谱图籍从海道往大都发运，这些珍贵文物都完整无缺地到达目的地。由此可见，他们运漕北上是有相当把握的，取得成功决非偶然。《元史·食货志》赞他俩的功绩：“海道富盛，岁运三百六十万石，供给京师，甚为方便。”后来，张瑄官至江南行省参知政事，朱清官至大司农。前者相当于省长，后者位列三公。海盗也好，海商也好，当到这么大的官确属

收见。

后来，他俩的子侄甥婿等亦皆为显宦，下至厮养门生佩虎符、金银符者上百。张瑄的儿子张文虎官至户部尚书，即财政部长。难怪上海要被视为海盗（海商）的世界，海盗（海商）的天下。元朝一度在商业和城市经济方面颇多开放，使这帮新贵得以在短时期内迅速发达起来，他们府第辉煌，富冠东南。他们的海舶往来国内外，远至日本、南洋与西洋。据《松江府志》记，当时仅上海县籍的“海船舶商、梢手”就有“五千六百七十五人”。他们的海上活动奠定了明初郑和巨型舰队下南洋、西洋的基础。张瑄独具一格的签章——品字章（三指染墨盖于纸上，如品字），也从上海流传到大都以至域外。

如果因为对张瑄、朱清实行了招抚，就认为元朝对海盗毫无制肘的话，那就错了。大元皇帝也有同四百年后康熙一样的小心眼。早在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明世祖忽必烈就下诏，宣布对外贸易实行官营，官府备船、出本钱、选商人，所得利润，官占七成，经办人得三成。

这无异是给张瑄、朱清所代表的海商阶层套上一道紧箍咒，从根本上决定了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果然，悲剧登场了。大德七年（1303年），张瑄在大都与丞相相争，权臣吴也夫一句话就把这两人打倒。该年冬，张瑄、朱清同日戮死，斩张文虎于大都西市，活着的子孙亦均遭放逐。上海海盗帮之患似已消除。不过，事情并未就此了结。张瑄、朱清的子孙看来亦非等闲之辈。他们中有人偷偷潜回了大都、上海。黄浦江畔仍有他们活动的踪迹，更不用说滔滔大海之中了。他们甚至仍在从事与日本等国的贸易。

大德九年（1305年）夏，显然是一股社会势力活动的结果，张瑄的孙子张麟在大都东华门前，向元朝中枢讼冤，大元天子

开恩赐慈，颁诏书于天下，为张家、朱家平反，张麟的父亲张文龙很快被任命为管理日本贾舶事务的最高官员，不久又升任都水监，仍负责督运海漕的重任。上海、刘河两处从此又“大通番舶，琉球、日本、高丽诸国咸集”。这里再次成为“天下都会”。

元代海盗(海商)给后人(包括康熙)留下了很多值得回味的东西。一般都认为沙船是当时发明的。发明者系上海的管军总管罗璧。其实，督造第一批 50 只沙船——平底海船的主要是张瑄、朱清及其手下的海盗(海商)们，而沙船最早的型体在上海地区的出现还要早些。正是这些海盗创造了载着上海驶向世界的沙船。从这个意义上看，像世界史上前资本主义时期出现的海盗一样，上海宋元以来的海盗确也起了一定的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虽然从道德评价来说，他们或许是作恶多端的。他们在犯下了可以称之为滔天罪行的同时，也把上海推向世界，使上海成为一座世界城市。

古代上海的第一幕海盗剧大致如上。需要强调的是它与明初郑和舰队远航的内在联系。如果没有前者提供的准备，后者的实现是不可想象的。郑和舰队中的上海籍航海人员及其他人员不少，后来史学家们发现这一史实时对此惊诧不已，但那在郑和下西洋时却可以说是必然的。

上海史上第二幕海盗剧显得更加混乱、更加复杂，也更加发人深省。它就是历史上“倭寇之乱”的上海片断——一个十分重要的片断。

如果任上海沙船的国际贸易发展下去，或许，倭寇之乱不至于发生，可是，朱洪武(朱元璋)没有这个肚量，亲信大臣、同甘共苦的起义功臣尚且为他所不容，上海的海商又怎能在他眼皮底下平安无事呢。他实行了严厉的海禁。